

崔

東

壁

遺

書

〔清〕崔述撰著
顧頔剛編訂

崔東壁遺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崔東壁遺書

〔清〕崔述撰著

顧頡剛編訂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上海社科院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80.76 插頁 4 字數 1,560,000

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5,000

統一書號: 11186·52 定價(七): (精) 9.20 元

崔東壁遺書序

顧頡剛

前記

一九三五年七月，我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一文的「附言」裏曾說過：

去年春夏間，逼着自己做一篇序文，要把二三千年中造偽和辨偽的兩種對抗的勢力作一度鳥瞰，使讀者明白東壁先生在辨偽史中的地位，從此明白我們今日所應負的責任。不幸人事太多，找不到整段的時間作此長文，旋作旋輟，只寫成了戰國、秦、漢間的一段，而很重要的識緯則尚未敘及（在這一年中，必作為專文發表。）……承史學年報索稿，因把此序略加修飾，易為本題發表。將來倘有時間，許我續作，那麼這篇「造偽和辨偽史」自必做完。因為漢以下的材料我已收集了些，其中的問題不多，只要有時間總是可以寫下去的。

這是四十五年前我為續作崔東壁遺書序許下的願言，可是在這樣漫長的時間裏，竟一直沒有空閒和機會來了却這一心願。一九七五年五月，翻閱以前的日記，在日記中又寫了一段「附記」，說明我當時的感慨。

崔東壁遺書序，雖寫得已不少，終以事冗未能寫完，其後改

崔東壁遺書 序

題為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，交燕大史學年報發表，實半篇耳。予是時社會關係已多，不可能如初入燕京時之專心，予之性格，青年之趨附，時代之動盪，三者各有其阻力，而壯年之光陰已去，勢不許其如願，思之憤懣！

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要重新排印這部書了，這就又逼着我非把這篇序文繼續寫完不可。經過了四十五年的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仍能在我有生之年裏，在我的學生王煦華同志協助下，完成這篇前幾年認為不可能寫完的文章，心裏格外感到高興。我深信後來的學者一定會把古史的考辨工作繼續做下去，終有一天會把偽古史和真古史區別得清清楚楚。這篇序文既是廣續前作，所以漢以前的部份就仍沿用原文，只作了少許文字上的修改。漢以後的部份，則是根據以前的草稿，加以補充修改的。

（一）古人缺乏歷史觀念

研究歷史，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。有了正確的史料做基礎，方可希望有正確的歷史著作出現。史料很多，大概可以分成三類：一類是實物，一類是記載，再有一類是傳說。這三類裏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，也有不可用於此而可用於彼的。作嚴密的審查，不

使它僭冒，也不使它冤枉，這便是我們研究歷史學的人的任務。

所謂僞，固有有意的作僞，但也有無意的成僞。我們知道作僞和成僞都有他們的環境的誘惑和壓迫，所以只須認清他們的環境，辨僞的工作便已做了一半。

我們研究學問的先決問題，第一是瞭解從前人的工作的結果，第二是認識我們今日所負的責任。現在許多人都在研究中國史，而中國的史料不可信的甚多，尤其是古史，又不曾經過整部的嚴密的審查，其中待我們努力解決的問題不知有多少。爲了鼓勵大家的工作興趣，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責任，所以我略略搜集戰國、秦、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的事實，作成這一篇，希望讀者認識這兩種對抗的勢力，以及批評精神與辨僞工作的演進，好藉此明白自己所應處的地位。

在述說這問題之前，我們該得知道，所謂「歷史觀念」，在現在看來雖是很平常的一種心理，但其發展的艱難却遠過於我們的想像。「致用觀念」，在石器時代已有了，否則人類就不會製造出這些器具。這個觀念從此發達下去，成就了今日的精緻和奇偉的物質文明。但歷史觀念超出現實，它的利益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，所以非文化開展到了相當程度，決不會存在於人們的頭腦裏。將來不可知；截至現在止，它還只限於少數人的使用。古代當然更不必說。這少數人既已有了這個觀念，一定忍不住，要發之於言行；然而敵不過多數人的懵懂，於是終被他們的宗教信仰或致用觀念所

打倒。這是無可奈何的悲劇！若要這種悲劇不發生，只有兩條路。其一，大家逢到一件事情，就肯想一想，不儘跟人家跑。其二，看到不如己意的議論和著作肯寬容，不要黨同伐異。能够這樣，歷史觀念的發達自然一日千里，而無用之用也定必超過致用觀念所收穫的實惠了。

只爲古人缺乏歷史觀念，所以最不爱惜史料；因而寫不成一部可靠的歷史。很古的時代如何，我們的智識不够，無從提起。且從武王克商說起罷。當他成功之後，史記上說他「命南宮括、史佚展九鼎寶玉」，「封諸侯，班賜宗彝，作分殷之器物」（周本紀），逸周書上說他「俘商舊寶玉萬四千，佩玉億有八萬」，以及麋、鹿、羆、豕等約一萬頭（世俘），他掠奪的只是些鼎彝、寶玉、牲畜，而不是殷商的歷史材料。固然，這種傳記百家之言也許是靠不住的，武王也許肯不注重實利；可是現有的證據已足够證明這些記載了。安陽的殷墟，在三十年中發現了四五萬片的甲骨卜辭，以後經中央研究院大舉發掘，連宗廟宮室陵墓的遺址也找出來了。然而地下挖出的遺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，而銅器和玉器乃至少。這不是銅器和玉器已全被搶光了嗎？因爲周人有致用觀念，所以把凡是值錢的東西都帶走了。又因爲他們沒有歷史觀念，所以想不到開辦一個「故宮博物院」。他們看盤庚以來二百餘年卜用的甲骨，正如我們看一大堆廢紙似的。說到這兒，真令我暗暗地叫一聲慚愧。十餘年前，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嫌明清內閣大庫的檔案堆積得太多了，又

占房屋，又費功夫，覺得討厭，所以就把它中不整齊的裝了八千麻袋，賣給紙廠，作爲造還魂紙的原料。司法部中藏有明朝的刑部老檔，總長朱深看它是過時貨，下令燒了。七年前，國都南遷，蒙藏院的檔案無人保管，全數散出，賣給攤販包花生糖果。究竟甲骨的用處不如紙張，不能製造還魂紙，也不能包裹糖果，周武王覺得不能獲利，扔下了。後來康叔封于衛，他也許嫌這種東西討厭，但它又不像紙張的容易燒毀，只得留下了。誰想過了三千年，這種廢紙竟沾了人們的歷史觀念的光，忽然發生了用處，害得許多考古家和古董商費了全副的精力去搜求，騰起很高的行市！又誰想現在人們的歷史觀念，只會應用於數千年前的檔案（甲骨），而不會應用於數百年中的檔案！唉，人類的進步是這樣慢的。

因爲古人太沒有歷史觀念了，所以中國號稱有五千年的歷史，但只賸下微乎其微的史料。現在再講一個故事。曹植做了鄴城侯，那邊有一座舊殿，是漢武帝的行宮，他拆毀了。因爲有人假借了神話來反對，他就下令道：

昔湯之隆也，則夏館無餘跡。武之興也，則殷臺無遺基。周之亡也，則伊、洛無隻椽。秦之滅也，則阿房無尺椳。漢道衰則建章撤；靈帝崩則兩宮燬……況漢氏絕業，大魏龍興，隻人尺土非復漢有。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，伊、洛爲魏之東京，故夷朱雀而樹闔闔，平建陽而建泰極。況下縣腐殿，爲狐狸之窟藏者乎！……（文選詞林六九五引）

他的話說得多麼爽快，有了新朝就該把舊朝的東西完全摧毀了！看了這文，誰還敢說中國人好古！在這種觀念之下，只有時行的留存與不時行的銷滅兩件事。然而不幸，歷史所記是十分之九屬於不時行的呵！

凡是沒有史料做基礎的歷史，當然只得收容許多傳說。這種傳說有真的，也有假的；會自由流行，也會自由改變。改變的緣故，有無意的，也有有意的。中國的歷史，就結集於這樣的交互錯綜的狀態之中。你說它是假的罷，別人就會舉出真的來塞住你的嘴。你說它是某種主義家的宣傳罷，別人也會從這些話中找出不宣傳的證據。你說它都是真的罷，只要你有點理性，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責備。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們的真或假罷，古代的史料傳下來的太少了，不够做比較的工作。所以，這是研究歷史者所不能不過而又極不易過的一個難關。既經研究了歷史，誰不希望得到真事實？既經做了研究工作，誰不希望早日完工？可是古人給我們的難題太多了，這個回答不好的責任是應當由古人擔負的，我們只有使盡自己的力量以求無愧於心而已。

（二）戰國、秦、漢間好古者的造僞

我們在前面既知道古人沒有歷史觀念，不愛惜史料了，但從別方面看，則中國民族又有一種癖性，是喜歡保留古代的語言方式。我們現在尙聞白話與文言之爭，好古者還想拿公元前數百年的白

話作爲二十世紀的通用文字。古代也是如此。我們在左傳裏讀到周王的說話，就知道他和春秋時一般人的口語有別。例如禧十二年，齊桓公使管夷吾平戎於王，王說：

舅氏！余嘉乃勳，應乃懿德，謂督不忘，往踐乃職，無逆朕命！

又如哀十六年，衛莊公使鄆武子告嗣位於周，王說：

朕以嘉命來告余一人。往謂叔父：余嘉乃成世，復爾祿次。敬之哉，方天之休！弗敬弗休，悔其可追！

雖然文氣卑弱，必不能像殷、周間文字的樸茂，但春秋時有摹倣古文字的風氣，即此可以推知。文既倣古，當然有偽造古書的。孟子《萬章篇》上有一段話：

象曰：「謨蓋都君咸我績。牛羊，父母；倉廩，父母。干戈，朕；琴，朕；弭，朕；二嫂使治朕棲。」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。象曰：「鬱陶思君爾！」忸怩。舜曰：「惟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！」

此文易「謀」爲「謨」，易「皆」爲「咸」，易「功」爲「績」，又省去許多動詞，如「牛羊父母」，「舜在牀琴」等句，顯見作者要表示其爲唐虞的真傳，故有意不循戰國的語法。其他孟子中所引堯舜事，又有「祇載見瞽瞍」，「瞽瞍底豫」，「舜尙見帝」等句，也都用了古字易去今字。在這種空氣之下，帝典就出現了，遼古的名人也都有著作傳下來了。作者沒有新發見的史料，也沒有時代的觀念，只憑了個人的腦子去想，而且用了貌似古人的文體寫出，拿來欺騙世人。戰國、

秦漢之間，這種東西不知出了多少。其後賴倣古而成名的甚多，揚雄的太玄和法言最能表現這個特徵。又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，把「揆其所始，至於所終」寫作「揆厥所元，終都攸卒」，把「大道於是成」寫作「大行越成」，把「深恩廣大」寫作「湛恩厯鴻」，把「化蠻夷爲文明」寫作「唵昧昭晰」，簡直不講文法，專堆生字，到了畫符念咒的地步。

他們既已爲了沒有歷史觀念，失去許多好史料，又爲了沒有歷史觀念，喜歡用古文字來作文，引出許多僞書。在這雙重的搗亂之下，弄得中國的古書和古史觸處成了問題。從前君主時代，君主的權力的基礎建築在經書上，於是「非聖無法」可以判死罪（例如嵇康以「非毀典謨」而受誅），大家死心塌地，不敢去想，倒也罷了。現在呢，君主是倒了。從前人沒有學術史的眼光，以爲最古的人是最聰明的（例如黃帝發明了幾十種東西，做了幾百卷書），什麼事情都是老早就規定妥當，不必由我們去想，倒也罷了。現在呢，知道智識由於積累，後人的本分是應追過前人了。我們在這種環境之下，哪能不起來問，哪能不起來幹。如果不這樣，我們簡直辜負了這時代。何況，在從前極束縛的環境之下，尙有起來問，起來幹的，我們如果在這大解放的日子裏還作無懷、葛天之民，試問有什麼面目對着他們？

（三）孔子對於歷史的見解

中國的文化中心，大家都知道是六經和孔子。六經的問題複

雜，我們先來看孔子。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，是有史以來第一部私家著作。我們可以在論語中看出孔子對於歷史的見解。

孔子雖是儒家的開創者，但這原是後來的儒家推尊他為始祖而已，他並沒有創立一種主義，也沒有定出什麼具體的政治計畫來。他雖常提起夏、殷，但夏、殷的歷史差不多沒有說到。八佾篇云：

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！」

他說夏、殷之禮的「不足徵」由於他們後裔杞、宋二國的「文獻不足」，似乎很能注意到史料上。但為什麼對於夏、殷之禮又兩云「吾能言之」呢？既已沒有史料，他怎麼去講歷史呢？這不使人疑惑？由我猜想，恐怕那時人對於夏、殷的故事都隨便說，孔子也不能免。所謂「不足徵」的，是史料。所謂「吾能言之」的，是傳說。照這樣講，孔子口裏的夏、殷之禮就有問題了。

他又說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。」（衛靈公）又說：「周監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（八佾）在這兩句話裏，可見他的心目中的夏、殷的禮對於周代人的效用只在「留備擇取」的一點。他只拿了致用觀念來看夏、殷，而不拿歷史觀念來看夏、殷，這個意思表示得非常清楚。（要是他用了我們的態度，就得問：「夏、殷的禮究竟是怎樣的？」「夏、殷的禮是怎樣構成的？」「夏、殷的禮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有什麼實用價值？」）在這種觀念之下，與周有關的尚可僅憑傳說，而與周無關的自然更不妨讓它漸滅了。

制度既已只備擇取，史事當然只備勸懲。在論語裏，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們說話時稱引的人，只是把人類的性質品行分成數類，每類舉出幾個最有力量的代表。例如做人君的要無為如堯、舜，勤儉如禹、稷，知人如舜、湯，做人臣的，要能幹如周公、管仲，忠直如史魚、柳下惠，識見如伯夷、蘧伯玉。他提起古人，不是傳授歷史知識，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。這種觀念原是當時人所通有的。因為日久流行在口頭的緣故，所以好人會儘量好，壞人會儘量壞。其實豈但當時人，就是現在，除掉研究歷史的專家以外，提到古人，誰不只記得幾個特別好的和特別壞的。你隨便走進一個戲園或評書館，就可以聽得能幹的姜太公和諸葛亮，勇敢的薛仁貴和楊繼業，奸詐的曹操和秦檜，方正的包龍圖和海瑞，以及武松、黃天霸等義士，李太白、唐伯虎等才子，楊貴妃、崔鶯鶯等美人，姐已精、潘金蓮等淫婦。這些演員和聽衆，並不要求知道這班古人的年代先後和他們的特殊的環境，只覺得古來的人，或善或惡，其翹然特出於人羣的，不過這幾個而已。有了這幾個，他們說話或唱戲時就儘够引用了，要尋一個人物作自己的模範時也有所取資了。當時子貢究竟是一個智識分子，他聽了抑揚過甚的傳說不免引起了懷疑。他道：「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（子張）這句話的反面，就是說，「周公之才之美不如是之甚也！是以居上流者，天下之善皆歸焉」。也就是說，「中流者非無善惡也，天下之善惡皆不歸焉」。這實在是一句聰明話，是我們的辨偽史中的第一

句話。

古時只有代表人物而沒有史。今日則既有留存於民衆心目間的代表人物，又有爲學者們所保存研究的歷史材料。這是古今的一大區別。古時雖以孔子之聖知，也曾起過「文獻不足」的感歎，但究竟受時代的束縛，惟有宛轉牽就於致用的觀念之下而已。

(四) 戰國以前的古史是「民神雜糅」的傳說

孔子的思想最爲平實，他不願講「怪，力，亂，神」，所以我們翻開論語來，除了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」二語以外，毫無神話色彩（這二語本是很可疑的）。其實那時的社會最多神話。試看左傳，神降於莘，賜號公土田（莊三十二年），太子申生縊死之後，狐突白日見他（僖十年），河神向楚子玉強索瓊弁玉纓（僖二十八年），夏后相奪衛康叔之享（僖三十一年），真可謂「民神雜糅」。歷史傳說是社會情狀的反映，所以那時的古史可以斷定一半是神話，可惜沒有系統的著作流傳下來。流傳下來的，以楚辭中的天問爲最能表現那時人的歷史觀，但已是戰國初期的了。（此文必非屈原著）

天問是一篇史詩，用了一百八十餘個問題來敘述當時所有的上下古今的智識。篇中先問宇宙的着落，再問日月的運行，這就是所謂開闢的故事。於是問到人了，第一個是鯀，問他爲什麼治洪水時要聽鵩龜的話，爲什麼上帝把他永遠監禁在羽山。第二個就是禹，問他在極深的洪水中怎樣的填起土來，應龍又怎樣的幫他治

水。第三個是康回，就是共工，問他怎樣一怒，土地就塌陷了東南一角。於是問到地方：東西南北哪邊長，太陽哪裏照不到，崑崙、黑水在何方。從此順了次序問起夏、商、周的歷史故事，其中也很多大可怪異的傳說，爲儒家的典籍裏所沒有的。

在天問中，禹是一個上天下地，移山倒海的神人，鯀是給上帝禁壓在山裏的。洪水是開闢時所有；平治水土不是人的力量，乃是神和怪物合作的成績。有了這個瞭解，再去看詩、書，那麼，玄鳥生商的故事，履帝武生稷的故事，「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」之句，「殛鯀於羽山」之文，均不必曲爲解釋而自然發現了它們的真相。

不但如此。史記秦本紀說秦祖女修吞卵生子，中衍鳥身人言，也可信爲當時確有的史說。山經記陝西西部至甘肅一帶是一個上帝的國家，而黃帝便是那邊的上帝，即此可知秦祀黃帝的緣故，又可知黃帝陵所以在橋山的緣故。其它如書中的「高宗彤日，越有雉」，金縢的「天乃雨，反風，禾則盡起」，以及趙世家中的秦識，大宛列傳中的禹本紀，拿那時人的眼光看來，正是家常便飯，無所用其疑怪。

我們可以說：在戰國以前，古史的性質是宗教的，其主要的論題是奇蹟說。我們不能爲了孔子等少數人的清澈的理性，便把那時的真相埋沒了。

(五) 墨子的託古

到了戰國，情形就大變。戰國以前整個社會建築在世官制度上。左傳上說「人有十等」(昭十年)，士以上爲四等，皂以下爲六等，爲的是要使他們「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」(桓二年)。但後來因交通的便利，商業的發達，庶民就有了獨立的地位。又因諸侯的吞併，地力的開發，大國益增富強，管理國家的事不是幾個精神衰老過慣舒服日子的世家大族所能爲，庶民中的賢者就起而擠倒了世官。大家要奪政權，就大家要有智識。這樣的社會組織的大變動，當然對于思想學術有劇烈的影響，古史傳說遂更換了一種面目。

學術界中第一個起來順應時勢的，是墨子。他有堅定的主義，有具體的政治主張。他的第一個主張是「尚賢」，他說：「雖在農與工肆之人，有能則舉之，……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。」他的第二個主張是「尚同」，他說：「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辨慧之人，立以爲天子；……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辨慧之人，置以爲三公。」這樣說來，一切世官等級，他們是準備全部打倒的；誰有本領誰做官，哪一個最有本領就請哪一個做天子。這等堅決的主張當然會博得民衆的多數同情，所以就是和他勢不兩立的儒家，也不能不採取他的學說。大學裏說的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，中庸裏說的「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」，以及堯典的「克明峻德」一章，皋陶謨的「日宣三德」一章，都是儒家承受墨家學說的證據。

但當時人最沒有時代的自覺，他們不肯說「現在的社會這樣，

所以我們要這樣」；只肯說「古時的社會本來是這樣的，所以我們要恢復古代的原樣」。然而，戰國的時勢是從古未有的創局，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來呢？這在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看來，是絕對沒有辦法的事。但他們有小說家創作的手腕，有外交家說謊的天才，所以容易得很。他們說：「舜是從畎畝之中舉起來的，伊尹是從庖廚之中拔出來的，傅說是從版築之間解放出來的，膠鬲是從魚鹽的商場中挑選得來的，所以農夫也可以做天子，廚子、囚徒、魚販們也可以做大臣。他們又說：「堯把天子讓與舜，舜把天子傳與禹，所以天子之位不是世襲的，一個天子老了就應當在他的臣民中選擇一個最有本領的人，把天下交給他管。這就是所謂「禪讓說」。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賢主義，然後會發生堯舜的禪讓故事。這些故事也都從墨家中流傳到儒家，而我們小時就在四書中熟讀，認爲至真至實的古代史了。

不過，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。墨家講兼愛，儒家則講親親。墨家主張澈底尚賢，儒家還要保全貴族的世祿。所以從墨家的平等眼光看來，除了舉賢無第二法；從儒家的等差眼光看來，傳子比了舉賢還重要。因此，禪讓的故事，儒家雖因時勢的鼓盪而不得不受，但總想改變其意義。這一個苦衷，我們若小心讀孟子就可明白。

當禪讓說極盛的時候，燕王噲聽得着了迷，一心想追蹤堯舜，就把國政完全交給他的相子之。有人對他說：「禹本來是傳天下與益的，但因他的兒子啓在政治上也有權力，啓糾集黨羽攻益，把天

下奪回來了。照這樣看，禹在表面上傳天下於益，其實是令啓自己奪取。現在你雖把國家交給子之，然而官吏大都是太子手下的人，實在還是太子用事呵！燕王噲是真心效法堯、舜的，就把官員的印一起收了，交給子之，由他任用。子之南面行王事，燕王噲反做了他的臣。這樣三年，燕國大亂，將軍市被和太子平合謀，起兵攻子之；齊宣王又從外邊打進去，把子之打掉，燕王噲也死了。（事見戰國策燕策一及史記燕世家）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之下的大犧牲。當燕國亂時，有人詢問孟子的意見，他答道：「子之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之。有仕於此而子悅之，不告於王而私與之，……則可乎！」（《公孫丑下》）以一個「言必稱堯、舜」的人而對於熱心模仿堯、舜的子之，子之反持這種冷酷的態度，實在令人無從索解。倘使他用了同樣的句法，說「堯不得以天下與舜，舜不得受天下於堯」，禪讓的偶像豈不是就此打碎了嗎？

有一次，萬章問他：「堯把天下傳給舜，有這件事嗎？」他用了批評燕事的態度回答道：「沒有，天子是不能把天下送給別人的。」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，當然把這件故事推翻了。於是萬章再問道：「舜的天下是誰給他的呢？」他回答一句空洞的話：「是天給他的。」萬章這人真利害，又反問他一句道：「天把天下給他的時候是明明白白的對他說話嗎？」這話要是問在西周時，那時的人當然回答說，是的，因為大雅裏就有「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」（《大明》），以及「帝謂文王，予懷明德……」（《皇矣》）等句，天和人直接談話的事是很尋常

的。但孟子的時代和他的學說已不容他這樣神道設教了，所以他答說：「天是不說話的，但借了人事來表現他的意思而已。」萬章再逼進一層，說：「怎麼借了人事來表現呢？」問到這樣，他再沒有什麼辦法，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杜造出一段故事來，說道：「舜相堯有二十八年之久，這是天意。堯崩，三年之喪完了，舜避到南河的南面，好讓堯子繼承了天子之位，然而朝覲的諸侯不到堯子那邊去而到舜這邊來，打官司的也不到堯子那邊去而到舜這邊來，歌頌功德的又不歌堯子而歌舜。舜被臣民愛戴到這樣，他不做天子也不成了。這就是從人事上表現的天意！」（《萬章上》）這些話雖然講的是堯、舜，其實是針對燕王噲的讓國說的。倘使子之能相子之二十餘年，噲死之後他也離去燕都，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，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禪讓了。然而這和堯典所謂「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異朕位」，「格汝舜，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績，三載，汝陟帝位」，「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」諸文能相合嗎？堯典中分明說堯直接讓位於舜，而孟子偏說舜是由臣民擁戴起來的，與堯無干，這不够矛盾嗎？這樣看來，孟子所說的是儒家的堯、舜，而堯典所記的竟是墨家的堯、舜了！

豈但孟子反對禪讓，荀子的態度更要激烈。他在正論篇裏大聲疾呼道：

世俗之爲說者曰：堯、舜擅讓。是不然！天子者，勢位至尊，無敵於天下，夫有誰與讓矣！……

曰：死而擅之。是又不然！……聖王已沒，天下無聖，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。天下有聖而在後者，則天下不離，朝不易位，國不更制；天下厭然，與鄉（向）無以異也。……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，則天下如歸，猶復而振之也；天下厭然，與鄉無以異也。……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，致順而治，論德而定次；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。夫禮義之分盡矣，擅讓惡用矣哉！

曰：老衰而擅。是又不然！血氣筋力則有衰，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。曰：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。是又畏事者之議也！天子者，勢至重而形至佚，心至愉而志無所詘，而形不爲勞，尊無上矣。……老者休也，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？故曰，諸侯有老，天子無老；有擅國，無擅天下；古今一也！

夫曰堯舜擅讓，是虛言也！是淺者之傳，陋者之說也！不知逆順之理，小大至不至之變也！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！他的話說得何等決絕，徑斷禪讓說是「虛言」，是「淺者之傳，陋者之說」。比了孟子一方面說唐虞不是禪，一方面又說「唐虞禪」的扭扭捏捏、藏藏躲躲的態度，高明了多少？再拿荀子的話來和堯典比較，則「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罷朕位」，豈不是「老衰而擅」；「帝乃殂落」；……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豈不是「死而擅之」；而「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」，又豈不是「堯舜擅讓」呢？堯典所言竟沒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對的。堪笑後世讀書人都自居於儒家，而對於孟、荀二大師之說似乎不曾看見，確認禪讓是唐虞之事，這是粗心

呢，還是不敢提出這問題呢？

孟、荀二氏都不願意聽禪讓之說，然而想不到從根本上解決，所以他們的反對不能成功。倘使他們能找出這傳說的源頭，說「這是墨家爲了宣傳主義而造出來的，我們儒家不該盲從」，豈不就連根剷去了？推求他們所以不說這話的理由，就因爲他們沒有歷史觀念，自身又被包圍於這樣的空氣之中，所以雖覺得這些話不對，而竟找不出辨偽的方法來。

由墨家的主義下所造成的故事，除此之外，可以推測的還有二端。

其一，「命」本是古人所最信仰的，到墨子始因激厲人們奮鬥的勇氣，主張非命。但現在《尚書》中，《湯誓》載桀之言曰：「時日曷喪，予及汝皆亡」，西伯戡黎載紂之言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，那麼，這兩位亡國之君都是主張信命而被人打倒的。固然這也許是周代史官的垂誡之作，但也大有從非命之說出來的可能。看《非命》上篇說：「於仲虺之告曰：『我聞於夏人矯天命，布命于下；帝伐之惡，龔喪厥師』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。於太誓曰：『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，……乃曰：吾民有命』，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。」可見他確把桀、紂當做定命論者的偶像，而作爲他的攻擊的目標的。

其二，墨子提倡尚賢，又注重實利與節儉，所以他把各種器物都定爲聖人或聖王所作，見得當時創造的艱難，現在使用的人應當

鄭重。節用中篇說，「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；……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；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；……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，於是教民以兵行；……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，於是利爲舟楫；……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；……聖王……爲宮室之法，把百姓日用的東西一起歸於明王聖人的德惠。其他辭過、非儒諸篇中也都有同樣的制法說。這原是他矯正世俗侈靡的好意。但是自從有了這個提示，創造事物的傳說就覺得有整理編排的必要，世本的作篇應時而興，把任何事物都確定了一個創始者。主張改制說的人見了，又利用這一套話作爲改制的根據，表示任何時代都可創造新事物：這就是淮南子《汜論訓》上的一段話。易學專家見了，也想把這一說應用到周易上，恰好易傳中有「以制器者尚其象」之文，就選取了十三卦分配制作，而有庖犧氏取離作網罟等等的故事。

墨子是創造理論以順應戰國時勢的第一人；因爲他鼓吹的最早，所以由這一學派發生的故事最爲深入而有力，一般人也忘記了這是墨家所創造的了。

(六) 種族融合過程中造成的兩個大偶像

在戰國的時勢中又有一個大運動，其性質的重要或者還超過了世官的破壞，這是種族的融合。本來「諸夏」和「蠻夷」的界限分得很嚴。所謂諸夏，是夏、商之後，和由西方入主中原的姬、姜兩大家族。在這四族以外的，都被看作蠻夷。雖有很高的文化的楚國，奄

有西周舊畿的秦國，中原人還是用了蠻夷的眼光看他們，而他們也自居於蠻夷。吳國，中原人都已承認他們爲泰伯之後了，然而春秋經還稱其王爲「吳子」，和赤狄的潞子一例。燕國，分明是召公奭之後，但因離中原稍遠，與鮮虞、山戎比鄰，故當張儀說燕王時，燕王還說，「寡人蠻夷僻處，雖大男子裁如嬰兒」（燕策一）。可見除了種族的關係以外，還有地域的關係。那時的中夏是何等的狹小，諸夏是何等的稀少呵！

其實，就是諸夏的基本團體，夏、商、姬、姜四族，他們也何嘗出於一家。夏的一族的來源固不可知，但商族是自以爲「天命玄鳥」降下來的（商頌），周族是自以爲上帝憑依了姜嫄而生下來的（大雅及魯頌）。這些事情的真不真是另一問題，但他們對於自己的祖先，都以爲由於上帝的命令而出現，這個觀念的存在是鐵一般的事實。因爲有了這種觀念，所以他們不承認始祖的前一代是人，他們不承認本族和別族有共同的祖先。至於姜姓的人，他們自己說是四嶽之後，而四嶽是共工的從孫，也不會和其他三族認做本家。

當春秋時，居今河北省南部的有白狄，居今山西省南部的有赤狄（這是說一個大概，白狄也有在陝西的，赤狄也有在河北的）。其他以戎爲名的，陝西有犬戎、驪戎、大戎，河北有山戎，湖北有盧戎，河南有陸渾之戎及揚拒、泉皋、伊雒之戎。以夷爲名的，山東有萊夷，江蘇與安徽間有淮夷。淮夷或者是一個總名。那時江、淮之間，種族部落至複雜。姓嬴的有江、黃、徐諸國。姓偃的有六、蓼、桐、英氏及舒、蓼、舒

庸、舒鳩諸國。不詳其姓的又有州來、鍾離、鍾吾諸國。更往南行，又有羣蠻和百濮。這些部落各有其歷史的文化；不幸他們不是諸夏，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古史乃是諸夏傳下來的，所以找不到材料，似乎沒有什麼問題。其實那時的部族是說不盡的交錯複雜，問題之多乃遠過於我們的想像呢。

但是過了春秋，越滅了吳，就統一了東南部；楚東向滅越，又南越洞庭，西越巫山，就統一了淮水和長江兩流域。秦滅義渠和蜀，就統一了西北和西南兩部。齊向海上開拓，燕向東北開拓，趙向北部開拓，又統一了許多異族的地域。齊下韓、魏，雖困居腹地，不得發展，也能融化中原諸戎狄。他們各為求富強，打了無數回仗。戰爭的結果，他們開闢了無數地方，這些地方是向不受中原文化的浸潤的；他們併合了無數部族，這些部族是向居於諸夏之外的。這樣地工作了二百餘年，於是春秋時的許多小國家和小部族全不見了。再經秦、漢的統一，於是他們真做了一家人了。

他們為要消滅許多小部族，就利用了同種的話來打破各方面的種族觀念。本來楚的祖是祝融，到這時改為帝高陽（後人說他就是顓頊）了。本來秦是玄鳥隕卵，女修吞而生子的，到這時也是顓頊的苗裔了。趙祖非子，非子也是女修之後，秦和趙就同祖了。本來越是純粹南方部族，和諸夏沒有絲毫關係的，到這時也是禹的子孫了。本來匈奴在極北，越在極南，無論如何聯不起來的，到這時都成了夏禹的後裔了。禹是被稱為顓頊之孫的，那麼越和匈奴也就同祖

了顓頊了。田齊自稱舜後而舜是顓頊的六世孫，他們也就與秦、趙、楚、越、匈奴為一個系統下的分支了。這幾個有名的國家如此，許多被併的小部族當然都溶化於一鑪了。

以上說的是顓頊一系，還有帝嚳一系。自從甲骨卜辭發現以來，從裏邊尋得了「高祖夔」和「賁于夔」諸文，研究的結果知道夔即是帝俊，也就是帝嚳。（王靜安說）而帝嚳即是命玄鳥下凡的上帝，簡狄乃是下界的女子，二者有神和人的區別。天問裏說，「簡狄在臺，嚳何宜？玄鳥致貽女何喜？」即是說的這事。帝嚳為商族的宗神，可無疑義。但周族是興于西方的，從初興到滅商也不過十數代，比了商的世系有四五十代的，歷史的長短相去懸殊。而且他們的文化有種種差異，顯然是兩個很不同的種族。周的始祖后稷雖也說是上帝之胤，但那時的上帝是很多的（看山海經可知），商的宗神當然不即是周的宗神。然而到了種族混合大運動的時候，這兩個仇讐的種族忽然結成了親兄弟了。他們說：「帝嚳是一位人王，他的元妃是姜嫄，產了后稷；他的次妃是簡狄，產了契。不但如此，他還有一個次妃，叫做慶都，產了帝堯。在這幾句話裏，埋着不知多少的矛盾，只消細心讀書便沒有不覺得的。」

據他們說，自古以來的朝代只有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五個。照這樣分配，虞、夏屬於顓頊系，唐、商、周屬於帝嚳系，似乎組織民族史的任務已告終了。但他們還覺得不滿意，以為這兩枝必須併到一幹上纔好。黃帝本是一個最有權力的上帝，於是他們就把他從天

上拉下來了。他們說：黃帝生昌意，昌意生顓頊，這是一支；黃帝生玄囂，玄囂生蟠極，蟠極生帝嚳，這是又一支。靠了這一句話，顓頊和帝嚳就成了同氣連枝的叔姪。二千餘年來，大家都自以為是黃帝的子孫，原因就在這裏。可惜逝者已矣；若能把戰國以前人從地下喚了起來，問他們這件事，他們一定摸不着頭腦呢。

記載這樣的世系的，有五帝德、帝繫諸篇，今在大戴禮記中。司馬遷雖說這二篇「儒者或不傳」，但他自己畢竟相信，所以全載入史記的本紀和世家中。

他們豈僅把上帝拉做了人王，使神的系統變作了人的系統；而且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來，使橫的系統變成了縱的系統。如伯夷，本是姜姓一族的祖先；皋陶，本是偃姓一族的祖先；益（或伯翳），本是嬴姓一族的祖先（見左傳及國語）；他們都請來放在堯典裏，使得他們和夏祖禹、商祖契、周祖稷成了同寅，於是這一班人的時代整齊劃一了。太皞，是任、宿、須句、顓臾諸國的祖先；少皞，是鄰國的祖先；共工，是齊國的祖先；大庭氏，是原住在魯國之地的（見左傳及國語），他們取來一齊說為古帝王，於是顓頊、帝嚳之前又堆上了許多的王者了。這樣一來，任何異種族異文化的古人都聯串到諸夏民族與中原文化的系統裏，直把「地圖」寫成了「年表」。

又不但此也，因種族的融合而使古代的疆域也隨着發展。本來所謂中原，不出黃河下流及濟水流域。夏、商、周千數百年間的都城，只有西周因舊國所在，建都於渭水流域，其它哪一個不是在

黃河下流。勢力所及，西不度隴，南不越淮水、荆山。所以商、頤雖誇言武功，而說到邦畿，只有「千里」。孟子以王道為其理想中的最高成就，他說到古代疆域，也不過是「夏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」。荀子疆國篇中又說：

古者百王之一天下，臣諸侯也，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。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，是乃江南也；北與胡、貉為鄰；西有巴戎；東在楚者乃界於齊，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，在魏者乃據圉津，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，其在趙者刻然有荅而據松柏之塞，負西海而固常山：是地偏天下也。……此所謂「廣大乎舜禹」也。

這裏說的是秦未滅六國時的疆域，把現今的地方來編排，除了陝西、四川兩省較為整齊外，其餘在湖北（沙羨），河南（臨慮），山東（圉津），河北（荅）的都是些零星小塊，然而荀子已詫歎為「廣大乎舜禹」，可見就是到戰國之末依然不會把古代的地域放大。其後始皇二十六年成了統一的功業，丞相王綰等上帝號議云：

昔者五帝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興義兵，誅殘賊，海內為郡縣，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

到三十四年，置酒咸陽宮，僕射周青臣進頌道：

他時秦地不過千里，賴陛下神靈明聖，平定海內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為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……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

這都是說五帝的地方不及秦始皇的大，當時爲「諸侯」而今日爲「郡縣」，當時「不能制」而今日「由一統」。這是秦代公認的事實，還不曾改變舊日的地理觀念。所以琅邪臺刻石云：

普天之下，搏心揖志；器械一量，同書文字。日月所照，舟輿所載，皆終其命，莫不得意。……六合之內，皇帝之士，西涉流沙，南盡北戶，東有東海，北過大夏；人跡所至，無不臣者。……這不是誇口，是事實。哪裏知道，古代的疆域竟因始皇的赫赫之功而改變了！

我們先看淮南子罷。他說古代的聖王，是：

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，……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至陽谷，西至三危，莫不聽從。（主術訓）

他說古代的暴君，又是：

紂之地，左東海，右流沙，前交趾，後幽都。（秦族訓）

夏桀、殷紂之盛也，人迹所至，舟車所通，莫不爲郡縣。

（汎論訓）

在這種思想之下，於是凡秦臣向始皇進的頌辭都成了「古已有之」的了。說淮南不足信吧，再看五帝德：

顓頊……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濟于流沙，東至于蟠木；動靜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礪。

帝嚳……執中而獲天下；日月所照，風雨所至，莫不從順。

禹……巡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澤，度九山，……據四海，平九

州，戴九天；……四海之內，舟車所至，莫不賓服。

這不是把琅邪刻石之文生吞活剝了嗎？大約齊、魯儒生對於始皇的功業看得眼紅了，不忍不把這一套話套在古聖王的頭上，好使五帝的地方不止千里，五帝的威德也追得上始皇。倘對此說還有疑惑，試想一想堯典和禹貢就更明白了。我們不必管九州和十二州的大規模的地方制，只須看「同律度量衡」不是「器械一量」嗎？「東漸于海，西被于流沙」不是「西涉流沙，東有東海」嗎？假使始皇之世已有了堯典、禹貢，這些「不師古」的君臣爲什麼偏要鈔寫古帝王的老賬？

禹在古代的傳說中，本是平地成天的一個神人。到了這時，既由始皇統一的反映，逼得古帝王的土地必須和他一樣廣，於是禹的偶像遂重新喚起，而有禹貢一篇的著作，把當時的境域分做九州，硬叫禹擔此分州的責任。其後爾雅有釋地等四篇，不管裏面的話和禹貢有無衝突，亦於篇末記云：「從釋地以下至九河，皆禹所名也。」即此可見，戰國、秦、漢之間，造成了兩個大偶像：種族的偶像是黃帝，疆域的偶像是禹。這是使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的；這是使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的。二千餘年來，中國的種族和疆域所以沒有多大的變化，就因這兩個大偶像已規定了一個型式。除了外族進來混合在中國人的集團裏之外，中國人總不願把這個舊型式有所改變。所以雖不會很縮小，也不會很擴張了。

(七) 孟子的託古

戰國是一個儘想升級的時代，平民要求高升做官，諸侯也要求高升做王。到宇內有了八九個王時，王位又不尊了，就再進一步稱帝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舊制度已崩壞，新制度又急待創造，這是很費經營籌畫的一件事。加以史料散失，更有無從取材之苦。例如孟子，北宮錡問他，周朝的爵祿是怎樣排列的，他答道：

其詳不可得聞也。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。

這原是很老實的話。當時的諸侯爲要適應時勢，創立新制，而苦於守舊的人的反對，所以先把古代傳下來的文籍消滅了。在歷史觀念沒有發達之際，受了致用觀念的壓迫，出此殘暴的手段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孟子既已看不到古籍，自己承認不知道，也就完了。但他又說：

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……

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……（萬章下）

他所說的制度是從哪裏出來的呢？我們知道，他根據的是春秋。在春秋經裏，宋稱公，齊、魯、衛、陳等稱侯，鄭、曹、秦、燕等稱伯，楚、邾、鄆、吳等稱子，許和宿稱男，非常的固定，使人一看就可知道周王封建時所定的等次是如此的。春秋稱爲孔子所作，還在諸侯去

籍之前，當然可以說是真事實。所以二千餘年來，大家對於孟子的話從不覺得有可疑之點。不幸得很，這幾年來金文研究發達，在彝器裏找出來的五等爵的材料，或者是和春秋不合的，如燕、曹稱侯，秦、邾稱公，鄆稱伯，許稱子；或者是亂稱一起的，如燕稱公又稱侯，邾稱伯又稱侯，芮稱公又稱伯，邾稱伯又稱子。這就把人們對於春秋經的信仰動搖了。不但如此，大孟鼎說「殷邊侯田」，新出土的矢令方彝說「眾諸侯侯田男」，這就令人想起了康誥裏的「侯甸男邦采衛」。加以研究，纔知道尚書裏的「侯甸男」就是脫掉了侯字的重文，當時大國稱侯，小國稱侯甸男或簡稱爲男，而公爲通稱，伯是長義，子是國君之子或是還有問題的國君（如蠻夷酋長），這些名詞並不和侯與君同列在一個系統。（說詳傅斯年論所謂五等爵）至於采、衛，乃是疏遠之封，所以鄭語引史伯之言曰，「姁姓鄆、邾、路、偃陽，曹姓鄆、莒，皆爲采、衛」。即此可知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」的五等爵，不是傳訛，便是作春秋的人有意定出來的等級，與真正的古制不合。春秋一書本和孔子沒有關係，所以論語中一字不提。大約到了戰國的中期，一班儒家受了時勢的鼓盪，要想替將來的天子定下制度，他們在魯國的史官處找到一堆斷爛的記事竹簡，就來「筆則筆，削則削」，寄託他們的政治理想，騙人道：「這是孔子作的，孔子行的是天子之事。」

從春秋的著作看來，可知那時的儒家是怎樣的爲這大時代打算。他們對於未來的憧憬是借了過去的事實來表示的，所以他們